

书人茶话

从文本到行动：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李宏图



《政治的视野》
[英] 昆廷·斯金纳 著
王涛 孔新峰 罗宇维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昆廷·斯金纳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教授的《政治的视野》一书，此书原版在200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思想史家，斯金纳精心挑选了自己所发表过的作品，按照不同的主题辑为三册出版，依次为《论方法》《文艺复兴德性》和《霍布斯与公民科学》（中译本即出）。斯金纳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回望一生，自己富有价值能够传世的文章不多。在我看来，斯金纳过于自谦，这部三卷本的著作可算传世之作，能够在60余岁学术最为成熟之际，将体现自己学术代表性的文章集结出版，由此可见此书的水准。中文学界一直在期待此书能够早日出版，时至今日终于面世，要感谢译者的辛劳，为学界奉献了这部皇皇巨著。此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学界系统了解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理路，而且也对推进国内思想史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大有裨益。

“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昆廷·斯金纳出生于1940年，受业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这本书汇集了斯金纳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并于次年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此后，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继续开拓，在马克思主义、共和主义、思想史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著有《马基雅维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法庭上的莎士比亚》（译林出版社2023年）等。

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荣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

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至高地位。长久以来，他一直被认为“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不仅被看做是著名的学者，而且也是位思想家。学界甚至认为，在当代，斯金纳是可以排在全球前十名的思想家。

因其创造了新型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因此也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并成为国际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对这一学派，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关注到了，21世纪初，国内开始对这一学派陆续展开系统性梳理介绍，经过多年努力，使其成为在中国学界耳熟能详的学派，其理论和方法也被很多学科所采纳运用。

确立理解现代国家的标准

作为一个学派的开创者，如果历数斯金纳的学术贡献，首先应该要提到其成名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书中，斯金纳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确立了理解

现代国家的标准，而这一点对于学界而言非常重要。斯金纳说：“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因为我设法说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公认的近代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种转变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做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随着把国家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然而又是非人格的权力来分析，我们可以说是进入了现代(modern)世界。此时现代的国家理论尚有待建构，但它的基础已经完备。

对“国家”和“自由”意涵的探讨，集中体现在第二卷《文艺复兴德性》之中。在

这一卷中，斯金纳重点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为道德和政治思想史所作的贡献（第11页）。涉及共和、国家、自由等一系列关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同时也考察研究了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的思想。正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进入到对英国革命时期一批思想家如弥尔顿、霍布斯等人的理解，从而在逻辑上也自然接续过渡到了第三卷《霍布斯与公民科学》，解释霍布斯对“国家”和“自由”的不同理解。这也如斯金纳所说：“欧洲现代政治思想最深刻的分歧，一边是佛罗伦萨的自由和自治政府理论，主要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提出。另一边则是国家的现代理论，将国家视为不受控制的主权的负载者，这一理论由17世纪绝对主义的捍卫者提出，在霍布斯的哲学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第18页）

思想家的文本就是一种行动

任何研究范式的形成总是要以方法论作为支撑，斯金纳自然也是如此。如果要评判斯金纳的学术贡献的话，尤其

需要重视他对思想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贡献。而这集中体现在《政治的视野》三卷本中的第一卷：《论方法》。

思想史研究首先要面对如何处理文本，对此，斯金纳一直呼吁和坚持要将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由此发展出现在被大家统称的历史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这一研究范式。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们在写作这些文本时究竟在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施行性(performativity)，强调我们需要以互文的方式来处理文本。当然，我的志向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把握他们的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复原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论方法》总序）

当代英国思想史家蒙克曾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斯金纳等人的努力，在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研究中有了“一场历史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追寻作者的行动和意义的历史，并且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从‘文本中所引出来的意义’必须是一种在历史上可以辨别的意义”。

面对后现代对作者主体的解构，斯金纳始终捍卫着文本作者主体性的地位，其最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从作者的角度认识世界”。由于受到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特别是“语言就是行动”的影响，斯金纳一直坚持，为了要理解思想家文本的意义，我们不仅需要复原作者们说了什么，还需要复原他们做了什么。由此，思想史家需要理解言语行为，为此又需要通过复原该行为体

现的意图，来表明某个言语行为的具体性质。正是在这一主旨下，研究者就需要考察作者如何写就文本、利用何种修辞方式组织文本，以及为何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和形式。于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这里发生了转换位移，正如斯金纳的学生、也属于“剑桥学派”的第三代学者阿纳贝尔·布瑞特所概括的：“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只是孤立地研究‘伟大的观念’和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只是把思想史视为与人类行动的历史相区别的一种历史类型，并且把‘语言’当作思想家们的思想或观念的一种表达。现在，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思想史研究对象发生了转换，重点研究思想家‘言说’的方式，以及如何运用‘言说’去思考。因此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关注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找寻过去的‘表达方式’，发现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即‘修辞’。”

在斯金纳看来，“文本即行为”。思想家写就的文本不仅是对那个时代论辩的一种介入，思想家们的写作实际上也是在进行一种行动。如果说从文本到行动是在学术意义上所展现的一种令人叹服的创造，那么在我看来，在这一研究范式的后面，何尝不是隐含着斯金纳这位思想史家对当下时代焦点问题的介入与行动？无论是对现代国家，还是对自由内涵的考察，莫不如此。就思想史家的一种行动而言，坊间还曾流传过有关斯金纳的一则趣闻，也许正包含了行动的另一层指向——由于斯金纳的杰出学术贡献，他可以获得爵位，而他断然回绝：“作为一位共和主义者，我不接受那一具有贵族等级制的封号。”每每想到这一趣闻，总是让我肃然起敬，因其不仅可以让人更为深刻地理解何为“言语行为”，以及“思想家的文本就是一种行动”这一方法论的命题，而且也依照什么原则展开行动的层面上，为世人作出了榜样性的示范。

好书过眼

三味书屋

谁知道于非闇呢？

蒙木



《于非闇小辑》
于非闇著 沈宁编注
天津出版社出版

学校导师、准旗人世家子、一代报人。《闲人不闲》有一篇文章叫“闲情先生”，好闲于非闇自况：“东海望族，北京世家，乃闲于事物每以闲情寄之。”“先生好读书……坐为大学教授”，“先生精八法，草情隶韵，得龙蛇飞走之妙”，“先生擅六法，濡毫泼墨，写剩水残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先生健谈，谈锋犀利……于读书作画书篆刻之余，则谈天说地，种种栽花，当编辑，充教授，考证闲情之学，笔之，以鸣其闲情”。又有“闲人不闲”篇也不是吹牛：“我言论我的技能，除了相面、算命、看风水、承颜希旨、灭着良心行事说话我不会外，诗文书画、声色狗马，我能来两下，只是赋性憨直，闲帮不起，客也懒得做，我只会做些闲事……闲人也实在不好做。”

于非闇的闲，是一种老北京人不屈服的雍容姿态，透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文化自信。这总让我想起启功先生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显。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一代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麟鹿逐兔，掣狗捉狸，皆乐之不减。”

细读《于非闇小辑》诸文写作大致在1926年12月到1948年12月这22年间，大概也是近现代北京最没落消颓的一段时期。正是1926年早时侯张作霖、吴佩孚联合组建北京政府，企图南北齐共分天下；广东国民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也开始北伐，整个北京都在惶惶之中。1928年北伐胜利，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降格为北平。《食货花鸟》有“击小鼓者”：“自国都南迁，北平骤失凭借，土著乃愈不得生，固不仅商贾萧条也。《故都漫墨》有“民间谚语”：“今者东北沦陷，倭寇日深，还我河山，委卜何日，亡国”谚语，竟尔奇中，言念前途，为之凛然。”刊于1931年10月19日《北平晨报》。1933年4月，日军进攻华北，5月，进占通州……《故都漫墨》又有“北平灰尘”：“北平这地方，毕竟是好地方……以我久住在北平，虽在当年红光飞机结对来游览的时候（《塘桥》前二三日），我也要与城俱殉。那么，这点灰尘，我希望它永远在我的头上吹着。”

于非闇的闲，是那深重苦难的移情。《书画过眼》有“长台兰亭帖”：“因为我嗜好太多，所以遇到国难家愁，拂逆至极，心身两伤的遭际，我总是模模糊糊地活下去，一直到现在将近耳顺之年了……我把有限的这点精神，都寄托在我的嗜好上。我嗜好写字，见了一种碑，一种帖，读文章，学书法，或者还要查查书，校校拓本，天如果不是当时当地，如果不是当时当地，原子弹如果不是当时爆炸的话，那我这迟钝而枯干的脑子里，起码在这几个钟头之内，是清静的，无渣滓的，只有这种碑或这种帖，热没有旁

的。我差不多天天啃窝头，这窝头的滋味里，也仿佛知道了碑帖的滋味。”

在这困苦中，他写他的金石书画，他的北京掌故，声色犬马，北京沦陷后的日常见闻；“北平向为谣言之策源地，而七八年来，谣言地失其重心，虽有谣，虽谣言孔多，而老北京之安堵不为动如故，此非示镇静，特习为故常，见怪不怪耳……此中情形，乃愈故都之神秘可爱。”

我们即使剥离掉充盈欲滴的情感因素，回到研究的眼光来打量，这里大量的掌故亦足以补史之缺。姑且不说那些帝师铁帽子王、傻五张疯子、黄兴蔡锷们的际遇令人唏嘘，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徐悲鸿等名家交往的风流逸韵，俞菊痴、余叔岩、梅兰芳、孟小冬等的梨园细节淋漓动人，就像《故都漫墨》有一篇“京师学校”：“光绪之季，京师学校大兴……在西郊有圆明园八旗学堂者，为赵芝田所办，其成绩与三堂相颉颃。袁项城所立之北洋四校，亦冠绝一时。京师之有女校，自振儒始。振儒为崇伯秋园所立，崇故后，校亦废，此皆谈北京者所不可不知也。”

谈北京，我们不可不知者，何止崇伯秋园的振儒女校，何止袁项城的北洋四校，何止赵芝田的八旗学堂？其实又何止于非闇的这套书？

《于非闇小辑》印行以来，有很多人问我：书是好，但卖给谁？谁知道于非闇呢？作为一名书业从业者，我始终觉得，一本好书如果能够唤醒一个并不安分惯于被去人推送知识的灵魂，些微薪火能传下去，也许也足够了。喜欢《于非闇小辑》的朋友不止三五，如果三五年后，有更多的人寻找《于非闇小辑》，那将会是策划者的欣慰。毕竟，图书至今仍然是人类智慧留存的最值得信任之载体……



于非闇所作的工笔花鸟画

钟叔河：『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话』

读《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

萧跃华

近日拜谒钟叔河先生，获赠装帧精美、印刷精良的大作《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钟先生投我所好于扉页签名题跋：“萧跃华先生存念。九十四岁钟叔河，甲辰病中于念楼。人生知己难，文章知己尤难。萧君虽小我三十余年，亦文章知己也。赠此以念。又及。”

大作分“书话”“琐谈”“往事”“自述”四辑，收入散文76篇，取其中一篇标题作书名。这些散文过去大多看过，返京的高铁上又温故知新，钟先生读书、编书、写书的一幕幕涌上心头。钟先生年近古稀回忆“我的第一位老师——列那狐”。那年他五岁，大他十多岁的表哥找来郑振铎译、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童书。他打开灰绿色的封面，立即被洁白的洋纸上印着的精致而又生动的钢笔画所吸引：“就这样，列那狐把我引进了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15岁，他模仿古人用文言文写笔记体《蛛窗述闻》（海豚出版社2016年11月小稿影印出版），只为好玩有趣而已，从没想过将来当作家。钟先生曾奉“平生无大志，只求六十分”为座右铭，人生规划是当老师，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可17岁的他喜欢的周南女校的一名16岁女生报考了新华社和报社合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他“便跟着她去考”。结果钟先生考上了，她却受不了第一次很普通的批评，一赌气去了新疆。

“我是典型的早恋、早婚、早育，年轻时并没想到要做出多大的成绩。”但先生毫不避讳自己年轻时候的“不肖”，但在人生旅程中的苦难激发了他的进取精神，他下定决心好好读书，用事实证明自己并非一无是处，更不像有人所说的那么坏。他与夫人患难夫妻相濡以沫，力佣为生，妻子成为五级木模工，丈夫成为六级划线（绘图工）。随着家庭收入的逐步“增加”，原先只淘几毛钱一本旧书的钟先生，后来两块四毛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也敢买回家了。令他在出版界一战成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单行本，多是这个时候用白菜价捡回来的。钟先生“引车夜归，闭门寂坐”，浏览过郭嵩焘、曾纪泽、戴鸿慈、康有为、梁启超、容闳、黎庶昌等人的200多篇原作。

祸兮福之所倚。钟先生在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时，凭手艺和会写文章被安排到工业队兼“搞宣传”。他通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答案。外人看来百分之百的蹉跎岁月，他却觉得捡了个“便宜”：“尽可以在劳动之余暇‘自由’地考虑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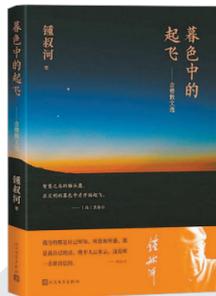
“阅读从来是我的生活。”曾国藩教子书《知堂书话》《卖书人和读书人》《买旧书》……这位把读书当成最高生活的出版家，有着与翁森《四时读书乐》不同的感受：“老实说，读书是用心甚至伤心的事，带来的不一定是快感，往往是伤感，甚至痛感。”（《因何读书》）这与孙犁所说，“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钟先生48岁半路出家干出版，敢为人先，出手就是高峰，在新中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钟先生将他自己离休前的40多年干过时间“天下三分”，大约“只有一分是在当编辑匠”，“写‘出版说明’，一直到快要离休和离休之后才应朋友之请，开始写点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偶有所感，发而为文，一定是心里有话要说，而且这话一定得是他自己的话。钟先生谦称：“如若说这些东西亦稍有可取，这便是写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的话。”哪怕引用或发挥先圣贤哲的名言，他也要“先经过咀嚼品尝，把自己几十年的辛酸苦辣与之相调和，变成自家炉锅里舀出来的汤汁”。“尽管它可能说得不够美不正确，总归是我自己的话，不是鹦鹉学舌，也不是吠影吠声，这一点是差堪自信的。”（《说自己的话》）

钟先生对1600多年前的车胤、孙康这两个读书晚景提出质疑。他读初中二年级的冬日晚上熄灯后，悄悄来到雪地月光下读《儒林外史》，虽然有“明月照积雪”映着，可睁大眼睛也只能依稀辨识几个笔画简单的字，终于无法卒读，只好老老实实钻进冰冷的被窝去做好学生。我和小儿于京城大雪之夜带着大字本线装书“映雪”过，确实影影绰绰，“囊萤”钟先生没实验过，而我却多有体察。夏日夜晚，湘中山村，小朋友结伴去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玩耍，大概谁说这玩意儿也能够照明读书，大概三五个小孩都不会相信的。“可是，像这类美化‘模范人物’的‘大头天话’，‘师父拿来教训子弟，却一以贯之地教了百上千年，从来没有有人揭穿。”（《囊萤映雪》）明末的“浮白主人”开过这两尊偶像的玩笑，似乎并未影响他们继续高高地被供奉在神龛上。

《千字文》有关蒙恬造笔、蔡伦造纸之说影响甚广，几成定论。钟先生从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张华的《博物志》、韩愈的《毛颖传》、马永卿的《懒真子》等书入手，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觉得祖先把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功勋记到伟大人物个人名下的可能性比较大。“小炉匠秦太上老君为行业神，戏班子尊唐明皇作祖师爷，看似荒唐，其实无非是典籍中黄帝造舟车、神农做耒耜的通俗化，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全都是偶像崇拜的表现。”（《恬笔论纸》）

黄裳称张岱为“绝代的散文家”，钟先生也说：“我于古人中，最喜张岱的文章。他的风格，可以说四字括之，就是‘自说自话’，绝不作陈言套语。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冷寂之意自然流露，能感入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稽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暮色中的起飞》）钟先生的《汉口竹枝词》《李鸿章的诗》《清朝的官俸》《湖南官话》《时务学堂何处寻》……走的就是“自说自话”的路子。他认为：“古文最简约，少废话。这是老祖宗的一项特长，不该轻易丢掉。”他身体力行“学其短”，将文章写得短小精悍、清爽爽。其晚年代表作《念楼学短》《清言》20多万册，何故？杨绛的《序言》一语中的：“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读了能增广学识，读来又趣味无穷。”



《暮色中的起飞——念楼散文选》
钟叔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